

中国社会发展三论： 转型·分化·和谐

Three Discour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
**Transition, Polarization and
Harmony**

刘祖云 著

中国社会发展三论： 转型·分化·和谐

◎ 余世维 著
◎ 陈光武 编
◎ 陈光武 等著
◎ 陈光武 等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www.cyp.com.cn

中国社会发展三论： 转型·分化·和谐

Three Discour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
**Transition, Polarization and
Harmony**

刘祖云/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社会发展三论：转型·分化·和谐/刘祖云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8
ISBN 978 - 7 - 80230 - 793 - 3

I. 中… II. 刘… III. 社会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1812 号

中国社会发展三论：转型·分化·和谐

著 者 / 刘祖云

出版人 / 谢寿光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中心 (010) 85117872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项目负责 / 范广伟
责任编辑 / 曹义恒
责任校对 / 陈 静
责任印制 / 盖永东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鑫联必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20
印 张 / 16
字 数 / 280 千字
版 次 /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80230 - 793 - 3/D · 248
定 价 / 3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刘祖云，男，1954年11月生，湖北武汉人，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导师。1972年高中毕业下乡务农，曾任农村大队党支部副书记。1977年考入大学，先后获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学士、南开大学社会学硕士和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91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2005年先后在华中师范大学和武汉大学同时或交替担任院长、系主任，并牵头创建社会学本科点、硕士点和博士点。先后应邀访问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及澳门大学等国内外十余所著名高校，1998～1999学年度为香港浸会大学访问教授。先后主持国家和省部级十余项人文社会科学重大和重点项目的研，出版《从传统到现代》等专著并主编《发展社会学》等专业教材十余部，发表专业论文近百篇。曾获教育部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等奖等重要奖励。

目 录

I	社会转型论	1
一	社会转型：一种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	3
二	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	14
三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标志	22
四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特征	33
II	社会分化论	39
一	社会分层的若干理论问题新探	41
二	再论社会分层的依据	54
三	再论社会分层的功能	65
四	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20世纪末中国社会的 阶层分化	74
五	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再论当代中国社会的 阶层分化	90
六	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三论当代中国社会的 阶层分化	98
七	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四论当代中国社会的 阶层分化	106
八	阶层分化研究中的若干争议问题探讨	119

九 生活资源与社会分层：论中国中部城市的 社会分层	129
十 权力资源与社会分层：再论中国中部城市的 社会分层	143
十一 农民：一个典型的结构性弱势群体	160
十二 农民工：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特殊阶层	169
 III 社会和谐论	 185
一 社会转型与社会和谐 ——探讨社会和谐的又一视角	187
二 转型期的社会失衡	194
三 转型期的社会失调	219
四 转型期的社会失序	236
五 转型期的二元社会结构	246
六 转型期的二元组织结构	260
七 转型期的二元人格结构	270
八 社区转型与社区建设	284
九 转型期的城市社区建设	289
十 转型期的城市社区服务	297
十一 香港与内地的城市社区服务比较	303
 后 记	 313

I 社会转型论

“社会转型论”由4篇论文构成。该部分首先结合中国社会转型实际探讨了社会转型的基本含义（第1篇）；然后探讨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第2篇）；最后分别探讨了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标志和基本特征（第3、4篇）。

一 社会转型：一种特定的 社会发展过程^{*}

转型，是指事物从一种运动型式向另一种运动型式转变的过渡过程。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变的过渡过程。那么，我们所说的社会转型，究竟是指社会从哪种社会类型向另外何种社会类型转变呢？社会转型的性质和状况如何呢？从社会学角度看，笔者认为应从如下方面来把握社会转型这一概念。

（一）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型 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过程

我们知道，采用不同的标准，可以对社会进行不同的分类。如马克思主义者以生产关系特别是其所有制方面为标准，将前后相继的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它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以生产力特别是其技术方面为标准，将前后相继的人类社会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以社会的政治方面特别是其民主程度为标准，将前后相继的人类社会划分为专制型社会和民主型社会，等等。

我们所说的社会转型显然不是建立在上述社会分类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这样一种社会分类的基础之上。“传统”与“现代”这样两种社会类型的划分来自于社会学

* 此文曾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发表，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社会学》1998年第2期全文转载。

研究。在西方早期社会学家的社会发展理论中，把社会一分为二，即划分成对应的两极，这是一种较为普遍和流行的研究方式。如英国的斯宾塞将社会划分为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法国的迪尔凯姆将社会划分为“机械联系社会”和“有机联系社会”，德国的滕尼斯将社会划分为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德国的韦伯将社会划分为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美国的梅约将社会划分为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美国的贝克将社会划分为宗教社会与世俗社会，等等。所有这些社会类型二分法学说最终得到一个经典的概括，社会划分被归结为“传统”与“现代”这样两种类型。于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类方法由于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而成为社会学家们研究、分析和判断社会发展程度和水平的基本方法。反观上述社会分类，我们可以发现，“军事社会”、“机械联系社会”、“礼俗社会”、“身份社会”及“宗教社会”等都从不同角度或侧面反映了传统社会的特征，而“工业社会”、“有机联系社会”、“法理社会”、“契约社会”及“世俗社会”等则从不同角度或侧面反映了现代社会的特征。“传统”这一概念往往与落后的、不发达的、静止的、封闭的和陈旧的社会状态和观念相联系，而“现代”这一名词往往与先进的、发达的、流动的、开放的和新生的社会状态和观念相联系。尽管这种划分显得过于简单、笼统和含混，但它为我们综合地把握社会的基本特征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框架。

既然如此，传统型社会和现代型社会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我们认为，传统型社会与现代型社会至少存在如下方面的区别：一是社会的基础产业不同。传统社会基础产业是农业，绝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而现代社会基础产业是工业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商业和服务业，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口超过了农业。二是社会劳动方式不同。传统社会因技术设备简陋而主要是手工劳动，现代社会因工业发明和科技进步而主要是机械化乃至自动化生产。三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程度不同。传统社会只有简单地（即依照年龄和性别等自然特征）进行的劳动分工，社会分化和专业化程度因此很低，社会的同质程度较高，现代社会有了复杂的劳动分工，社会组织的结构

与功能也随之高度分化和专门化，社会的异质程度较高。四是社会主要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不同。传统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是家庭组织和血缘关系，家庭担负着生育、生产、消费、教育、赡养、扶养及娱乐等多方面的功能，现代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是职业组织和业缘关系，家庭在生产方面的功能已经外移给社会职业组织，家庭在生活方面的功能逐渐外移给社区组织。五是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不同。传统社会中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是乡村社区，而现代社会中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城市社区。六是社会开放程度不同。传统社会因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而具有较强的分散性和封闭性，现代社会因其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流通乃至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而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七是社会管理的权威基础和主要方式不同。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以传统权威为基础，家长制管理是其主要管理方式，现代社会的社会管理则以法理权威为基础，科层制管理是其主要管理方式。

当然，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社会转型是建立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划分的基础之上，是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过程。

（二）社会转型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 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

我们在论及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时，容易给人们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似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两者之间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只有一朝跨过这条鸿沟才能进入现代社会。事实并非如此，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对于社会转型起步较晚、社会转型的最初动力来源于其外部的迟发外生型国家来说，社会转型的过程往往表现为现代因素由外到内、由表及里和由名到实的生成和发展过程。

1. 表现形式或发展途径之一：由外到内

由外到内是迟发外生型国家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因素生成和

发展的一个主要途径。社会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来源于社会内部而不是外部，因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然而，由于迟发展国家的社会转型都是在外在压力和影响下启动的，因而其现代社会因素最初不是从其内部产生，而是从其外部传入，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之间的斗争因此表现为社会内部因素与社会外来因素的斗争。这样，迟发展国家的社会转型就更加步履艰难，因为迟发展国家在其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得不面临并解决如何对待外来的现代因素、如何对待内在的传统因素，以及在内外因素结合过程中现代因素如何生成和发展等问题。换一句话说，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过程在迟发展国家表现为现代因素本土化和本土因素现代化的复杂过程。

现代因素本土化和本土因素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迟发展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这两个方面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从操作层次上讲，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迟发展国家在社会转型中如何对待本国传统，具体来说，就是现代因素取代传统因素的过程是与传统实行彻底决裂的过程，还是对传统实行变革的过程。对此，西方有些学者认为，西方早发展（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迟发展（不发达）国家的明天，因此，迟发展国家的社会转型即社会现代化就是“西化”，就是通过全面引入西方早发展国家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排除本国传统因素的障碍而步入现代型社会。这种带有浓郁西方中心论色彩的“思维定式”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台湾等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它们虽然已步入现代型社会，但其民族精神、人际关系及文化氛围等仍然是传统的、东方的。对此，西方学者又不得不承认：“尽管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但非西方国家无需在文化意义上西化，以及接受从西方国家中发展出来的现代性的具体文化形式和组织形式，也能发展出具有一切现代性特征的社会来。”^①由此可见，迟发展国家的社会转型或社会现代化并不是全盘西化，

^① [以] N.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第 57 页。

也不是与本国传统彻底决裂，而是通过现代因素的本土化来促进本土因素的现代化，是通过外来现代因素与本土传统因素的共契共容来生成和发展新的适合本土社会的现代因素，从而导致其社会从传统型走向现代型。

2. 表现形式或发展途径之二：由表及里

迟发展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表明，迟发展国家现代因素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又是一种由表及里的过程。社会学研究认为，从总体上说，中国社会转型是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正式开始的，到目前为止，这一转型过程大致经历了 1840～1949 年的启动和慢速发展阶段、1949～1978 年的中速发展阶段和 1978 年至今的快速和加速发展阶段。^① 无论是其启动阶段，还是其加速阶段，中国社会转型都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即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到思想文化层面的发展过程。

从其启动阶段看，1840 年开始的中国社会转型首先发生在器物层面上，其标志是追求“船坚炮利”式现代化的洋务运动；接着潜入到制度层面上，其标志是追求君主立宪式现代化的维新运动；最后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上，其标志是追求以西方民主、科学观念为核心的现代化的五四运动。

从其加速阶段看，1978 后的中国社会转型似乎也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到思想文化层面的发展过程，即经过 1978 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场思想大解放运动后，中国社会转型经历了国外现代化设备、科技及资金的大量引进（器物层面），经济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制度层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文化层面）这样一个由表及里的发展过程。

当然，上述两轮由表及里的社会转型过程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其一，前一轮转型是被动起步的，政府是其社会转型的阻力和障碍。而后一轮转型是主动开展的，政府是其社会转型的推动者和组织者。其二，前一轮转型所经历的不同层面之间存在一种负向

^① 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报告（1994～199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联系，即转型之所以相继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到思想文化层面，是因为前一层面的转型招致失败，转型才深入（准确地说是转移）到下一层面。而新一轮转型所经历的不同层面之间存在一种正向联系，即转型相继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到思想文化层面，是因为前一层面的转型获得成功才深入到下一层面。其三，前一轮转型速度慢并只导致社会的局部变化，后一轮转型速度快且导致社会的整体发展。

通过两轮转型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迟发展国家的社会转型一般要经历由表及里的发展过程，而由表及里、不同层面的社会转型应该相互联系、协调推进，否则其转型就达不到预期目的，甚至招致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我国党和政府提出的两个文明建设同步进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一方针将引导中国社会转型走向新的成功。

3. 表现形式或发展途径之三：由名到实

迟发展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还表明，其现代因素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由名到实的过程。所谓由名到实，就是先有现代化之名，然后才具现代化之实。有的社会学者将这一过程解释为从“什么应是什么”到“什么是什么”的过程。换一句话说，就是从现代化之“应然”到现代化之“实然”的过程。^①这一观点不仅是对社会转型一般规律的理论概括，而且为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所证实。这里仅以当前我国的城市化和科层化为例来说明这一过程。

城市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之一。如果说乡村是传统社会的化身，那么城市则是现代社会的代表，因此，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1978年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经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城市化也随之也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从城市化发展的外延方面看，有两项引人注目的变化：一是城市数量由1978年的192个增至1994年的622个，

^①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第66、67页。

16年增加了430个，而1949~1978年只增加了60个；二是城镇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1994年的28.62%，16年提高了10.7个百分点，而1949~1977年这28年才提高6.9个百分点。

然而，从城市发展的内涵方面看，我国的城市化水平特别是中小城市的城市化水平不高。到1994年，我国县级城市达413个，占全国城市总数（622个）的约2/3，占全国县级单位总数（2148个）的约1/5。县级城市的迅速发展为发挥中小城市作用、促进城乡一体化打下了基础，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确实存在一些名实不符的问题。从动态角度看，有的城市的扩建和发展快于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虚假城市化”现象；从静态角度看，有的城市无论在城市经济状况、基础设施、城市人口及城市景观等硬件方面，还是在城市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及管理等软件方面，都是“应然”与“实然”不相吻合，徒具城市之名。

科层化也是社会现代化的内容之一。科层制是一种分科执掌、分层负责的组织管理制度，如果说家长制是一种传统的组织管理制度，那么科层制则是一种现代的组织管理制度。因此，从家长制到科层制的转化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又一重要标志。从总体上看，当前我国的科层化水平不低，因为我国各级各类社会组织都建立了科层制组织结构、实行了科层制组织管理，但其发展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总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严重失衡，即不同地区（特别是城市与乡村）、不同行业、不同层级社会组织的科层化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二是名实不符，即社会组织的结构形式是现代的，而其运行机制往往又是传统的。有学者将此现象称为社会组织的二元性。^① 所谓二元性，是指当前我国的社会组织一方面具有现代的结构形式、运行规则、管理制度等，另一方面在实际组织运作、组织活动过程中又存在大量的、隐藏在正式结构背后的、与现代组织因素相异的，并实际发挥作用和效力的传统组织因素。美国学者李格斯将此种传统因素与现代因

^① 李金：《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福建论坛》1989年第2期。

素同时发挥作用与效力的社会组织称为“棱镜型组织”。^① 所谓“棱镜型组织”就是介于传统型与现代型之间的一种组织类型，因此，这一组织的出现表明我国社会组织正在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表明其组织中的传统因素已经由组织表层退入组织深层，由公开退入隐蔽，进而也表明现代组织因素正经历由名到实的生成与发展过程。

我国社会城市化和科层化的现状表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正经历一个由名到实的社会发展过程。仅从名实关系的角度看，社会转型即现代因素的生成与发展一般要经历无名无实（传统社会）、有名不完全有其实（转型社会）、有名有实（现代社会）这样三个阶段，而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正处于其中间阶段即转型社会阶段。充分认识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这一特点，不仅在理论上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和解释当前我国社会中的一些名实不符的现象，而且在实践上有助于我们更加切实有效地推进当前我国社会的转型。

（三）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的 社会发展过程

社会转型是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这是研究世界各国社会现代化实践过程所得出的结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在描述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时，“增长”与“发展”这两个概念往往是相互替代的，即认为社会现代化就是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数量增长，于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出现了哈罗德—罗马增长模型、罗宾逊增长模型、贫困恶性循环论、“大推进”理论等较有影响的现代化（实际上 是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因其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性而成为“社会发展”的代名词，社会现代化似乎只要走过经济增长的各个阶段就可以大功告成。此时，社会转型 = 经济增长。

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社会现代化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

^① 李格斯：《公共行政生态学》，（孟买）亚洲出版社，1961，第 90~92 页。